

书院文献编纂与尊朱辟王实践

——以瀛山书院为中心的讨论倡^{*1}

兰军 邓洪波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 410082)

【摘要】:瀛山书院源于北宋詹氏书堂,至南宋詹仪之以理学名世,遂有朱熹往来辨析大学之旨,朱子学说成为书院学统。隆庆二年,王畿门人周恪任遂安县令,复建瀛山书院,倡导阳明心学。王畿、钱德洪分别撰写耘瀛山书院记梓与耘瀛山三贤祠记梓,以朱子晚年定论为突破口意在促使书院由朱子学转向阳明学。万历七年,张居正禁毁阳明讲学书院,瀛山书院终以朱子过化之地免于劫难,开启了由王返朱步伐。清前期,王学趋于黯淡,朱子理学再兴,瀛山书院逐步展开尊朱辟王实践。乾隆年间编纂的耘四刻瀛山书院志梓即未收王畿记文,钱德洪记文也被刻意删改。明清之际的学术嬗变同时波及当地士人,地方志也对钱、王记文加以删减、批判。

【关键词】:尊朱辟王; 瀛山书院; 王畿; 钱德洪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17)03—0032—07

明中叶王守仁心学思想崛起,虽屡遭朝廷禁毁,仍盛行百余年。阳明歿后,良知学说虽由门人弟子传布于大江南北,但因各自领悟之差异而日渐分化,其弊端也日趋显现。晚明以顾宪成、高攀龙、刘宗周为代表的部分儒者在批判左派王学摒弃礼教、谈禅入佛之外,已兼采朱子学说对阳明心学展开修正。入清后,以张履祥、吕留良为代表的民间儒者在完成个人思想学术由王反朱后,即通过著述活动展开尊朱辟王实践。

目前学界对明清之际尊朱辟王现象的研究多集中于典型学者的思想分析及其开展的具体实践,立足于宏观层面梳理该现象演变脉络^②。本文则试图将研究视野聚焦于晚明以来浙江遂安士人在书院志、地方志编纂过程中展开的“尊朱辟王”活动。具体以隆庆年间王畿、钱德洪为庆贺瀛山书院重建而撰写的耘瀛山书院记梓耘瀛山三贤祠记梓在明清瀛山书院志、严州府志、遂安县志中的文本差异为中心,揭示学术思潮嬗变背景下书院士人对朱、王两种学术资源的褒贬历程。

一 偷梁换柱:书院志、地方志中瀛山书院记文之差异

¹收稿日期:2017-02-15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36);贵州教育厅项目:“阳明学在浙西书院的传播”(2015JD004)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兰军(1987—),男,山东蒙阴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书院历史与文化。

²①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张天杰、肖永明:耘从张履祥、吕留良到陆陇其——清初“尊朱辟王”思潮中一条主线梓,耘中国哲学史梓2010年第2期;张天杰:耘清初理学家的“由王返朱”心路转换梓,耘阳明学刊梓2015年。

②右侧耘瀛山书院记梓见刘从龙等纂修,刘闳儒、毛升芳续修:康熙耘遂安县志梓卷十,清康熙二十四年增修本。

1. 王畿耘瀛山书院记梓

王畿所作耘瀛山书院记梓是分析隆庆年间瀛山书院由朱趋王学术转向的关键文献。2007年凤凰出版社出版的耘王畿集梓将该文列入附录三逸闻辑佚，注明文献来源于民国耘遂安县志梓卷十^{[1] (P819)}。耘王畿集梓是吴震以现存最早的万历十六年(1588)萧良翰刻耘王龙溪先生全集梓为底本，校以其他文献整理而成。由此可判定耘瀛山书院记梓最初未收录于萧氏耘王龙溪先生全集梓。笔者通过查找相关文献发现万历六年刊刻的耘严州府志梓已收录有该篇记文^{[2] (P541-543)}。因耘瀛山书院记梓作于瀛山书院复建后的隆庆三年(1569)，故万历耘严州府志梓所载该文极有可能是最早版本。王氏记文在康熙耘遂安县志梓、光绪耘严州府志梓、民国耘遂安县志梓中内容相同，均是万历耘严州府志梓的删改本。为更清晰呈现两者内容之差异，笔者以列表方式将万历与康熙两志所收耘瀛山书院记梓全文抄录如下。

表1 万历《严州府志》与康熙《遂安县志》所载《瀛山书院记》对刊表^②

万历《严州府志》载《瀛山书院记》全文	康熙《遂安县志》载《瀛山书院记》全文
<p>遂境多崇山，瀛山距邑西北四十里，宋熙宁时有詹安者构书院于其岗，群族戚子弟而教之。山下凿池引泉，注之为方塘，以便游息。意在课子弟，取科第，期以节义文章名世也。厥后，孙仪之始慨然有志于学。仪之举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累官吏部侍郎。淳熙中与朱晦翁相友善，常往来山中，论格致之学，因为题方塘诗以见志。时有书问相辨析，所遗墨宝，至今犹存。但世远芜废，仅存书院之名而已。</p> <p>明隆庆戊辰，宛陵周子恪来令遂，周子伯兄太常君怡尝从于与绪山钱子游，深信师门良知之学。其治遂也，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每携同志诸子弟访瀛山方塘之旧，锐意兴复。聚材鳩工，辨方正位，命方应时董其役，方嘉会、方言等任其劳。经始于七月之望，再越月而落成，凡为屋二十有四楹，仍匾曰瀛山书院。中为格致堂，前为登瀛亭，后为二贤祠，規制宏丽，而数百年之既废者，焕然复新矣。应时谓事不可以无纪，因受命于周子走书币来征言。</p> <p>夫晦翁之学传五百年矣，自阳明先师倡致良知之教，风声便于海内，凡名区胜地，往往创置书院以为聚友讲学之所，贞志向学，不无其人。或尚未免徇名亡实，从意气上激注，知解上湊泊，甚至从门面格套上支撑，文章流为绮语，节义变为客气，未肯默默自反从身心性情上理会，以求自得之益。所以意气有时而衰，知解有时而穷，门面格套有时而废，虽读书业举以文章节义相期者，亦未免志有所夺，力有所妨，而道德之风日微，间有一二独立而不变者，譬如硕果缀于群阴之上，仅仅自守，得免堕落亦已难矣。周子乃能兴复若此，此硕果反生之兆也。夫道有本，学有机，不探其本，不循其机，虽豪杰之资，无从而悟入。千古圣贤，惟在</p>	<p>瀛山距邑西北四十里，宋熙宁时有詹安者构书院于其岗，群族戚子弟而教之。山下凿池引泉，注之为方塘，以便游息。厥后，其孙仪之始慨然有志于学。举绍兴二十一年进士，累官吏部侍郎。淳熙中与朱晦翁相友善，常往来山中，论格致之学，因为题方塘诗以见志。但世远芜废，仅存书院之名而已。</p> <p>明隆庆戊辰，宛陵周子恪来令遂，与其兄太常君怡尝从于与绪山钱子游，深信师门良知之学。其治遂也，以振起斯文为己任，每携同志访瀛山方塘之旧，锐意兴复。聚材鳩工，方应时董其役。经始于七月望，再越月而落成，凡为屋二十有四楹，仍匾曰瀛山书院。中为格致堂，前为登瀛亭，后为三贤祠，周子走书币来征言。</p> <p>夫晦翁之学传五百年矣，自先师阳明先生倡致良知之教，海内往往皆创置书院以为讲学之所，贞志向学，不无其人。然或徇名亡实，从意气上激注，知解上湊泊，甚至从门面格套上支撑，文章流为绮语，节义变为客气，未肯自反从身心性情上理会，间有一二独立者仅仅自守，得免堕落，亦已难矣。周子乃能兴复若此，此硕果反生之兆也。夫道有本，学有机。千古圣贤，惟在会理性情。喜怒哀乐未发之中，道之本也，其机存乎一念之微，</p>
<p>万历《严州府志》载《瀛山书院记》全文</p> <p>会理性情。是谓喜怒哀乐未发之中，道之本也，其机存乎一念之微，性情得而天地万物举之矣。</p> <p>孔子称颜子好学，惟曰不迁怒，所以反情而复性也。才动就觉，才觉就化，从一念上抉择，不待远而后复是。岂意气之可逞，知解之可求，门面格套之可倚，文章节义之可名，此之谓自得之学，至易至简者也。颜子没而圣学亡，千载不传之秘，始终于濂溪而传之明道，曰主静无欲，曰定性无事，此其的也。龟山、上蔡、豫章、延平皆令学者先立大本，观未发已前气象。师友渊源，相守以为学脉，沿至考亭，学始一变。其曰为学在于穷理，穷理在于读书，读书在于循序致精，而居敬持志以为之地。隔涉几重公案，延平尝欲授以未发之旨，自谓当时贪听讲论，又方酷好训话，不得尽心于此。至今若存若亡，无一的见，易简支离，孰同孰异，必有能辨之者矣。自先师发明不学不虑之旨，以开来学，循濂洛之绪，上遵洙泗之传，所谓未发之中也。慎其机于不睹不闻之微，推其至于无声无臭之妙，范围曲成，通昼夜之道，而知者惟此而已。</p> <p>先师尝谓「格致之说有异，每疚于心，因取晦翁全书读之，晦翁固已深悔之矣」。揭之以为晚年定论，所谓君子之过无伤于日月之明，圣贤之存心也。试举一二与诸君筹之。</p>	<p>康熙《遂安县志》载《瀛山书院记》全文</p> <p>性情得而天地万物举之矣。</p> <p>孔子称颜子好学，惟曰不迁怒，所以反情而复性也。颜子没而圣学亡，千载不传之秘，始发于濂溪而传之明道，曰主静无欲，曰定性无事，此其的也。龟山、上蔡、豫章、延平皆令学者先立大本，观未发已前气象。至考亭，学始一变。惟先师发明不学不虑之旨，所谓未发之中也。慎其机于不睹不闻，推其至于无声无臭，范围曲成，惟此而已。</p> <p>先师尝谓格致之说若与有异，每疚于心，因取晦翁全书读之，晦翁固已深悔之矣。</p>

有曰学之道惟在求放心，今一向耽著文字，令此心全体都奔在册子上，更不知有已，虽读得书亦何益于吾事耶。

有曰读书只为学中一件事，文字虽不可废，然涵养本源而察于天理人心之判，此是日用不可间断的事。今自家一个身心，不知安顿去处，而谈王说怕将经世事业别作一项伎俩商量，不亦谬乎。

有曰从前为学，实有向外支离之病，不惟误己而误人，亦不少近，方寻得一个头绪，似差简约端的，始知文字言语之外真别有用心处。

有曰此个大头脑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的。曰人生而静，曰喜怒哀乐之未发，人汨汨地过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实见，此体段如何会有用力处，凡此见晚年精诣之论也。

其他或间传疏读书穷理诸说，乃其蚤年未定流传世间，欲改而未之及，诸君取而玩之，亦可以无疑于用力之方矣。天理者吾心自然之条理，非有假于外也。若曰读书穷理，理果在于书已乎，问者曰然则为学之无事读书可乎，余曰游谈无根，昔人所戒，书何妨汝读，学者之读书有印正之义焉，其次有触发之义焉，其次有栽培之义焉，是谓以我观书，不以书缚我，善于读书者也。

今诸君所事者举业，所读者圣贤之书，而为学之志未免为其所夺者。非举业之能累人，繁华之念重，故视举业亦重，营营得失不能不为其所夺耳。若能审于名实之辨，屏斥繁华，专志于身心性情之务，炯然内照，观所谓未发之中以求自得，不得以意气门面之习汨于其间。身心之念重一分，繁华之念自然轻一分，早识而力反之，持衡之势也。诸君志本绝尘，而区区复以举业浚告之者，随方解缚是犹以世间豪杰待诸君也。若是出世间大豪杰意之所示，便当豁然，所谓见鞭影而走，岂惟不患妨功，即举业为德业，千古学脉亦将重有赖焉。

周子笃信师传，不缙于习，以政为学，以身为教，约己以廉，惠众以慈，敦士以礼，其复兴书院也，表先正而启发后人。扩其同善之仁而不为靡文，繁饰信施而易从所令，不反其所好，藏身之恕也，虽然良心难保而易失，旧习易溺而难反，有道者之所深忧也。不肖年踰七十，百念已隳，而求友一念，老而弥切，何时放剡曲之舟，策杖访瀛山，相与登格致堂，问活水之源，申究先师与晦翁证悟之因，以助成弦歌之化，非徒一叹而已也。书此以为左券云。

今诸君所事者举业，所读者圣贤之书，而为学之志未免为其所夺者。若能审于名实之辨，屏斥繁华，专志于身心性情之务，炯然内照，观所谓未发之中以求自得，岂徒以意气门面之习汨于其间哉。

周子笃信师传，不缙于习，以政为学，以身为教，其复兴书院可谓能表先正而启后人矣。不肯求友一念，老而弥切，何时策杖瀛山，相与登格致堂，问活水之源，申究先师与晦翁证悟之因，以助成弦歌之化，非徒一笑而已也。书此以为左券云。

通过对刊可以看出，王畿记文被删部分主要集中于从道统上批判朱熹、良知现成说与朱子晚年定论等敏感内容。龙溪认为儒者相守以传，注重内在心性探讨之学脉在朱熹手上出现了断裂。他在记文中构建了一个上自孔子、颜子，下至王守仁的心学道统谱系。有关该谱系的关键语句，诸如从周敦颐至李侗“师友渊源，相守以为学脉”，阳明良知之学“以开来学，循濂洛之绪，上邇洙泗之传”等均被抹除。王畿指出心学学脉沿至朱熹始一变，更以其口吻诋认未能延续儒家心性未发之旨，偏重于外在事物求理，致使道统若存若亡。瀛山书院记在宣扬阳明良知之教的同时还掺杂了不少龙溪即本体即工夫的直觉顿悟观。诸如“才动就觉，才觉就化，从一念上抉择，不待远而后复是”等均被删减。瀛山书院为朱熹过化与商补松大学梓之地，朱子理学已然成为书院所秉持的学术正统，王畿欲在此传播阳明心学，如何处理两者互相抵牾之处，显得尤为重要。正德十年(1515)，王阳明为减轻程朱儒者对良知学说的抨击，编订松朱子晚年定论梓弥补两者间的学术紧张。龙溪也试图以此作为楔入瀛山书院的突破口，在貌似尊朱旗帜下以王代朱。记文委婉道出阳明在提出“致良知”后即寻求与朱子格致说的共通之处，继而认定朱子晚年已发觉自身学说之不足，开始向心学靠拢。对朱熹其它与阳明心学旨趣截然对立的“传疏读书穷理诸说”，龙溪均将其归为“欲改而未之及”的中年未定之论。总之，松瀛山书院记梓透漏出王畿欲以阳明学取代朱子学，占领瀛山书院这一朱学阵地的意图，记文中的敏感话语因触及康熙年间遂安官绅尊朱意愿而被方志摒除。

2. 钱德洪松瀛山三贤祠记梓

钱德洪所作松瀛山三贤祠记梓也是分析隆庆年间阳明学意图传入瀛山书院的重要文献。据笔者所查，钱氏该记文在康熙松遂安县志梓已有收录，光绪松严州府志梓、民国松遂安县志梓续收且内容与之相同。钱氏记文因在言语、意图上较王氏松瀛山书院记梓委婉含蓄，被收录于乾隆松四刻瀛山书院志梓，但在内容上却遭删改。下表即以康熙志文与书院志文比对，以明晰书院志编纂者方宏绶对钱氏记文改动痕迹。

表2 康熙《遂安县志》与乾隆《四刻瀛山书院志》所载《瀛山三贤祠记》对刊表

康熙《遂安县志》载《瀛山三贤祠记》	乾隆《四刻瀛山书院志》载《三贤祠记》
<p>余读晦庵朱先生《方塘诗》，乃叹曰：“此朱子悟道之言乎，其所以承千圣之绪，下启后学之端，尽见于是诗矣。”今年五月，遂安方应时、方世义等持其乡达詹侍御理事状，乞余作《三贤祠记》。余阅之，乃知方塘在遂安瀛山之麓，晦庵尝自婺访詹虚舟仪之，往来论学于斯，既后门人筑书院于方塘之上，名之曰“瀛山书院”。岁久榛废，晦庵遗教亦绝响矣。</p> <p>邑尹周子恪来莅遂，访求方塘遗址，心悅之，乃谋于诸生，创复书院，而亭其上，又筑祠于书院后，妥朱子位于中堂，以崇祀事。所谓三贤者，左列詹子仪之，而虚其右，爰念周侯德教，将尸而祝之，以效畏垒之情。周子少事其兄太常君怡，继从余与龙溪王子游，深信师门之学，奋然以圣学为已任，下车未及期，政厘弊革，民怀其德，士趋其教，暇则与乡达彦士论学于方塘之上，关闽洙泗之气象复见于今日，则周子倡学之功与朱子等，生祀之以衍其教于无穷，宜已。</p> <p>余少业举子，从事晦庵《集注》《或问》诸说，继见吾师阳明夫子，省然有得于良知，追寻朱子悔悟之言，始信朱子学有原本，达圣道之渊微矣。故尝增刻朱子晚年定论，使晦庵之学大显于天下。观其方塘之咏，“一鉴澄清，云影天光，上下掩映”，想见其胸中空洞，万象森列。噫，亦何自而得此哉？源头活水，流而不息，言有本也。夫学莫贵于自得，斯逢源资深，道义之出无穷。今周子政根于学，学本于心，故临政未久而民知德。诸生服膺朱子，不泥其中年未定之说，而复因周子之政，以追原王门之学，自率其身以达之政，斯无愧于是祠之筑矣。</p> <p>余老矣，不能策杖与邑之乡达彦士歌游于胜地，因二生之请，姑叙其说而归之用，以寄吾之思云。</p>	<p>余读晦翁《方塘诗》，乃叹曰：“此朱子悟道之言乎，其所以承千圣之绪，下启后学之端，尽见于是诗矣。”特不知方塘在何地，后世亦有踵其芳躅而继发其余韵者乎？今年五月，遂安方应时、方世义等持其乡达詹侍御理事状，乞余作《三贤祠记》。余阅之，乃知方塘在遂安瀛山之麓，晦翁尝自婺访詹虚舟先生，往来论学于其上，名曰“瀛山书院”。迨历宋元之间，岁久榛废，晦翁遗教亦绝响矣。</p> <p>戊辰夏月，宛陵周子恪奉简命莅遂，访求邑中旧事得方塘遗址，心悅之，乃谋诸生方应时，创复书院，而亭其塘，耆民方志达等又筑祠于书院后，妥朱子位于中堂，以崇祀事。所谓三贤者，左列詹子仪之，而虚其右，爰念周侯德教，将尸而祝之，以效畏垒之情。周子少事其兄太常君怡，奋然以圣学为已任，下车未及期，即政厘弊革，民怀其德，士趋其教，暇则与乡达彦士论学于方塘之上，诸生跃跃然来歌来游，追想关闽洙泗之气象复见于今日，则周子倡学之功与朱子等，宜生祀之以衍其教于无穷也。</p> <p>夫朱子学有原本，达圣道之渊微。观其方塘之咏，“一鉴澄清，云影天光，上下掩映”，想见其胸中空洞，万象森列。此即唐虞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即孔门之鸢飞鱼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即孟子之存神过化，上下与天地同流；即程子之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噫，亦何自而得此哉？源头活水，流而不息，言有本也。夫学莫贵于自得，渣滓浑化，全体丕显，斯逢源资深，道义之出无穷矣。今周子政根于学，学本于心，故临政未久而民知三代之政可征，士信圣人之学可至，为有本也。诸生服膺朱子，则思其平生以必为圣人为志，而深造于圣学之渊微，爰率其身以达之政，斯无愧于是祠之筑矣。</p> <p>余老矣，不能策杖与邑之乡达彦士歌游于胜地，因二生之请，姑叙其说而归之用，以寄吾之思云。隆庆庚午五月缙山居士钱宽撰。</p>

由表可见，方宏绶对康熙志所载耘瀛山三贤祠记梓之删减首先体现在对周格的介绍上。“继从余与龙溪王子游，深信师门之学”被删，掩盖了周县令从学于王畿、钱德洪，为阳明再传弟子的背景，复建书院意在讲论王学之目的也被埋没。第二处删减集中于钱德洪肯定朱子晚年确有悔悟之说，欲以耘朱子晚年定论梓为旗号倡大阳明心学的言论。方宏绶将“余少业举子，从事晦庵耘集注梓或问梓诸说，继见吾师阳明夫子，省然有得于良知，追寻朱子悔悟之言，……故尝增刻耘朱子晚年定论梓，使晦庵之学大显于天下”部分删除，把“始信朱子学有原本，达圣道之渊微矣”的“始信”二字替换为“夫”字置于段首，下文接钱德洪赞耘方塘梓诗原文。经上述处理，钱氏肯定朱子晚年悔悟之言被改为对朱熹的由衷赞誉，倡导阳明心学的文字被彻底抹除。最后一处改动体现在将“不泥其中年未定之说，而复因周子之政，以追原王门之学”替换为“则思其平生以必为圣人为志，而深造于圣学之渊微”，如此隆庆年间瀛山书院在学术上由朱趋王的转向被置换为对书院生徒应深信朱子学说的劝勉。

删改之外，方宏绶对钱氏祠记还有一处增衍，旨在凸显朱熹的圣贤地位。钱德洪祠记原文对朱子耘方塘梓诗仅有两句盛赞，且是基于诗文情景的赞美与启示。方氏在两句之间增加“此即唐虞之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即孔门之鸢飞鱼跃，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即孟子之存神过化，上下与天地同流；即程子之见周茂叔，吟风弄月以归，有吾与点也之意。”旨在颂扬朱子上接孔、孟、周、程，凸显其在儒家道统中的显著地位。

二徘徊于朱王之间：晚明瀛山书院的学术嬗变

瀛山书院位于浙江淳安县城西北四十里，肇始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中宣大夫詹安为子弟读书应举而建的双桂书堂。南宋时，詹仪之与朱熹、张栻、吕祖谦、真德秀相友善，书院也从单纯追求举业转向讲明理学。乾道至淳熙年间，朱熹常往来瀛山与詹仪之论学，商补大学格致章，更有耘咏方塘梓诗传世。从此，朱子理学成为瀛山书院所秉持的学术正统，为后世不断构建与加持。

明隆庆年间(1567—1572)，王畿门人周格任遂安县令，在方应时家族协助下复建瀛山书院。周格字有之，号少峰，太平人，与兄怡俱受学于王龙溪，嘉靖三十四年(1555)举于乡，授遂安令^{[4] (P124)}。在遂安周格注重以理学接引士子，作耘格致微言粹致知难易解粹与诸生讲论，以改变士风。隆庆二年(1568)，周格访詹仪之墓，立碑彰表，又与诸生访瀛山书院故址，有意兴复。生员方应时、方世义等会意请修，率方氏家族子弟捐贖聚材，于隆庆三年九月建成。为在瀛山书院倡导阳明学说，周格特意延请王门高足王畿、钱德洪分别撰写耘瀛山书院记粹与耘瀛山三贤祠记粹。钱、王记文均以朱子晚年定论为突破口，意在促使书院在学术上由朱趋王。

隆庆四年(1570)，应周格之请王畿赴瀛山与遂安生员方应时等发起瀛山讲会。龙溪“沂富春，登瀛山，坐格致堂，举朱子晚年定论合文成奥旨。^{[5] (P718)}在龙溪倡导下，阳明心学已然成为该时期瀛山讲会之主题，“隆庆庚午，周侯恪以礼请抵瀛山，发明格致之学，风驰云附，称盛绝焉”^{[6] (P413)}。隆庆五年，周格升任顺天府司理，瀛山讲会在方应时主持下与天真书院相连属，获得进一步发展。嘉靖年间，钱德洪、王畿相继从绍兴移居杭州，担任天真书院主讲。每年四方弟子于春秋两次集聚天真，祭拜先师，随后举行长达一个多月的讲会活动，动则百余人，成为王门后学讲学传道的大本营。天真书院会讲时，方应时尝率瀛山诸生“担簦趋函丈受业，印证宛陵之所论说，昭若发蒙矣”^{[5] (P718)}。隆庆四年秋，方应时中举，方志载其虽“登贤书，公不喜得隽，而喜聆钱、王绪论”。王畿为此作耘梦征篇粹勉励方氏以讲明圣贤之学为己任，不负师友兴办瀛山讲会之期望。

隆庆六年二月，瀛山书院将周格奉祀于朱子之右，改二贤祠为三先生祠。周氏身为阳明再传弟子得与朱熹、詹仪之二贤并祀，反映出隆庆年间阳明心学在瀛山书院的显著地位。

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禁毁讲学书院，瀛山书院因讲论阳明学说面临废毁，在方应时斡旋下终以朱子过化之地，后人奉祀文公之所免于鬻废。“万历十年壬午夏五月，张江陵柄国，疏毁天下书院，令甚竣。瀛山亦因撤门额，不敢护。时方缙部尹长泰，长泰故朱子治邑，民祠于书院以祀。当道迫鬻，缙部力疏留之，瀛山亦援此例得不鬻废。”^{[6] P390}万历八年，方应时任长泰县令，正值朝廷禁毁书院。方氏在上报文书中奏明“本县只有朱文公祠一所，别无书院。……嘉靖乙酉年掌县事推官黄直更修，内扁瞻山仰斗门揭文公书院，历年春秋在此祭祀，并无生徒占住讲读经”^{[6] (P436-437)}意在阐明文公书院只是祭祀朱子的祠宇，非聚徒讲学、妄议朝政之书院，不属朝廷禁毁之列。因方应时据理力争，不仅长泰文公书院得以保留，瀛山书院也因属朱子过化之地援例免于废毁。

瀛山书院因讲论阳明学说在万历年间险遭废毁，借助奉祀朱子之所才得保存的教训使方应时家族在此后的书院活动中采取了逐渐淡化阳明学，凸显朱子学的策略。万历二十六年(1598)，方应时致仕归乡，与当地诸生继续讲学于瀛山书院。黄居中为方氏所作耘行状粹中评价其“即名王氏学，然实宗朱而衷陆”，可见其晚年在学术上确已呈现出由阳明学向朱子学的转变。方志也称其“锐志潜修，一宗紫阳之学”^{[7] (P624)}。万历后期阳明门人在学术上的分化及东林诸儒对王学左派的严厉批评，成为方应时与瀛山书院学术转向的重要背景。“自新建学兴，左袒陆而弃髦朱氏矣。要之袭躬行者以貌，袭神解者以言，揆以由中百不得一，即庭内不能无操戈，况望门而瞰者乎！”^{[5] (P720)}万历三十三年秋，方氏族人在瀛山书院三先生祠左新建方先生祠专祀方应时，有意忽略其早年信奉阳明学之事实，将之直接与朱子相联结。“一生命脉精神不啻与考亭相融结。在长泰士民尚铭其绩，奉祠配享，矧吾侪可无崇报之礼乎？”^{[6] (P427)}天启二年(1622)，方世敏编纂耘瀛山书院学规粹，从集事、讲学两方面指导书院士子修身、治学与处事。学规在制定上以“宗法紫阳，动中规矩”为原则，重新确立了瀛山讲会以朱子学为宗的学术旨趣。“吾侪果能恪遵夫格致诚正之训，以认取夫源头活水之趣，则一切条教皆属烦称”^{[6] (P427)}。在方氏族人经营下瀛山讲会一直持续到清初，讲习内容已由阳明心学回归朱子理学。

三口诛笔伐：遂安县志对王学之批判

明末清初对阳明心学流弊的深刻反思带动了程朱学说的发展。倡导较为质朴的朱子学反对虚妄空疏的阳明学已然成为一时风气。在此背景下，钱德洪、王畿所作瀛山书院记文因明显的尊王贬朱取向而被书院志、地方志编纂者有意忽略、删改甚至批判。王畿批判朱熹，试图以阳明学取代朱子学的耘瀛山书院记粹，因与书院尊朱旨趣背离而被有意忽略。民国耘遂安县志粹则

收录了康熙年间方迈所作耘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梓、民国初年陆登鳌耘瀛山书院记辩梓两篇专门讨伐钱德洪、王畿之辩文。两篇文章主旨相同，前者在言辞上更为激烈，且属于清前期王学学术转换阶段，故下文选取方氏记文再做解读。

耘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梓作者方迈为福建侯官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进士，曾任萧山、兰溪知县[8] (P273)。方迈致仕后以著述自任，有耘四书讲义梓耘春秋补传梓耘古今通韵辑要梓等经史著作。记文开头方氏即直接表明其主旨在于揭露钱、王所作瀛山书院记以微言阳尊紫阳，阴奉阳明之行径。“瀛山书院为紫阳讲学之所，而作记之者王龙溪、钱绪山则皆阳明之徒与紫阳为敌者也。故其记中之语，阳尊紫阳，而实阴奉阳明，所谓微其词以见意者，毫厘千里之辨，安可习之而不察乎。”[9] (P848)由此可见方氏所持辟王崇朱的坚定态度。

针对王畿所构建的心学学统，方迈通过对宋以来儒学学脉的梳理，直接将陆王心学排出在外。“诸儒正传孰非以德性为事，而世独外象山、阳明以为异学”。方氏认为象山之学传自孟子，与朱熹格物穷理之说可互补印证，两者之差异主要在于道问学与尊德性的先后次序及彼此轻重上。方迈认可陆九渊之学，目的在于解决多数儒者“不知象山之学非阳明比也”的问题，为集中批判阳明学做铺垫。“阳明少泛滥于词章，驰骋于孙吴，苦紫阳格物穷理之事为烦难，乃究心于佛老之学，练习伏藏得其见性抱一之旨，自谓有悟。”[9] (P849)宋明时期理学家大多对佛老之学有所汲取，方氏指责阳明学来源于佛老之说，将其判为异端的倾向已十分明显。为进一步论证其说，方氏认定阳明良知学说是孟子、颜回之学的片面截取与曲解。

于儒书中取孟子中良知一言合之大学致知之解自立一说。非孔非孟，援儒入墨而其立论，则偏与程朱相反。程子以为孟子才高难学，学者须是学颜子有准的，而阳明则以为颜子之学不传，惟孟子犹为可循。顾于颜子之学，凡所为博文约礼，克复四勿，择中得善，诸切实工夫，皆置不讲，而独举其不迁怒，不二过，以为颜子之学。[9] (P849)

从源头上将阳明学排除于圣贤之学后，记文以朱熹、王阳明在理学核心话题上的对立，驳斥王畿、钱德洪肯定朱子晚年存在的悔悟之说。方迈对阳明及其心学思想的批判在某些层面已超出学理范畴，含有明显的诋毁与歪曲。他认为陆九渊在为学上存在“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弊端，但对阳明的指斥则上升为“以为礼乐名物，古今事变，皆不必学”。除学术上认定阳明与朱子截然对立，与陆九渊分属不同门户外，方氏还指责其蛊惑蒙骗士人。“是阳明不特与紫阳为冰炭，亦且与象山分门户，盖其才似商韩，其学兼释老，是以当时日为功名之士，即不觉欣然喜之者，诚有以深中其隐也。”[9] (P849)

客观而论，方迈耘读瀛山书院及三贤祠记梓对王守仁、王畿之批判带有强烈主观感情色彩，部分评论已然失允。方氏似乎也意识到其评说难以服众，遂在文末承认当下儒者对朱、王学说多存在门户之争。“今之护紫阳者或欲推之于颜曾之上，而相阳明者亦欲引之于孔孟之徒，各阿所好，聚讼不休，然而皆非其正也。”方迈所生活的康熙年间，朝廷已将程朱学说确立为王朝统治思想，对朱子在儒家学统中的地位予以不断拔高。康熙五十一年(1712)，朝廷升朱子位居十哲之后。康熙帝为耘朱子全书梓撰写序文中褒扬其“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归。”[10]卷六十四方迈主张以朝廷对朱、王二人之评判为定论。“夫治法即道法，经正民兴，其权自上皇朝，考德论功，无偏无陂。崇祀庙廷，升紫阳于十哲之后，纂修国史列阳明千勋爵之班，可以息百家之横议，定子秋之邪止矣。”[9] (P849-850)以朱子为孔孟正传，将阳明划归事功勋臣，是方迈撰写此记文的主要意图。

明清时期，瀛山书院在学术上经历了一个由朱趋王再辟王崇朱的往返历程，每次转向背后均透漏出书院士人在学术嬗变大背景下趋利避害的抉择。隆庆年间(1567—1572)，阳明心学正风靡全国，身为阳明后学的遂安县令周恪有意建复瀛山书院以传播王学。周氏意愿在方应时家族积极响应下很快付诸实践，并产生了延请王畿、钱德洪为书院撰写记文，主导讲会之举。钱、王记文透漏出二人欲以阳明学取代朱子学，占领瀛山书院这一学术阵地的豪迈意图。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禁毁阳明讲学书院，瀛山书院在方应时努力下以朱子过化之地方免于毁坏，开启了书院由王返朱的趋向。明末清初王学流弊日深，尊朱辟王渐成学术大潮，在此背景下瀛山书院在院志编纂中有意删抹王学痕迹，与之相应地方志编纂者也对钱、王记文加以删改与批判，遂安再次以朱子过化讲学之地相标榜。

参考文献:

- [1][明]王畿撰, 吴震整理. 王畿集[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7.
- [2][明]杨守仁修, 徐楚纂. (万历)严州府志[M]. 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 北京: 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0.
- [3]仓修良. 方志学通论[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 [4][清]曹梦鹤等修, 孔传薪、陆仁虎纂. (嘉庆)太平县志[M]. 中国地方志集成·安徽府县志辑 62. 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8.
- [5][明]黄居中. 千顷斋初集[M]. 续修四库全书(第 1363 册).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2.
- [6][清]方宏绶等. 四刻瀛山书院志[M]. 赵所生、薛正兴主编. 中国历代书院志(第 8 册).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 [7][清]嵇曾筠修, 沈翼机纂. (雍正)浙江通志[M].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523 册).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6.
- [8][民国]欧阳英修, 陈衍纂. (民国)闽侯县志[M]. 中国方志丛书(第 13 号). 台北: 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66.
- [9][民国]罗柏麓, 姚桓纂修. (民国)遂安县志[M]. 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 214 号). 台北: 成文出版有限公司, 1975.
- [10][民国]葛韵芬纂修. (民国)重修婺源县志. [M]. 民国十四年刻本.